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李玉明

翼城枣园文化遗址

田建文
著

在新石器时代方面,目前已知最早者(山西),是枣园 H1 为代表的遗存。这里透露了一个讯息,即在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之前,山西有自己的东西。



目 录

引子	(1)
一、翼城：表里山河	(4)
二、枣园：天时地利	(7)
三、发现：千呼万唤	(9)
四、发掘：时不我待	(13)
五、遗存：情怀无限	(17)
六、村落：古风悠然	(19)
七、陶器：大巧若拙	(32)
八、生产：农业为本	(38)
九、归程：厚积薄发	(42)
十、启示：追寻万年	(51)

引 子

1926年10月,由留美博士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国人出于目的明确的、有计划地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后记》,《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大多数遗存都属于解放后1991年确立的“庙底沟类型”或文化,现在这一名称已逐步被“西阴文化”所取代(下文“西阴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互见,主要是考虑习惯问题)。1991年确立的“枣园 H1 遗存”,即“枣园文化”,是其前身。以陶尖底瓶、夹砂罐和花卉纹彩陶盆、钵、罐等为代表的西阴文化,强盛时期文化影响面和实际控制地带,约占长江以北,甘肃、青海以东的大半个中国。这是山西为中华民族早期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考古学,在不断的探索中走向成熟。到1990年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考古学区系类型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古文化、古城、古国”学说的成功实施,国家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的理性思考,使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也发扬了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所倡导的,朴素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精神。

正是在这自由民主、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1991年翼城县枣园村发现的“枣园 H1 遗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枣园新石器早期遗址调查报告》、《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文物季刊》1992年2期),

给山西省的考古学史,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利用新材料,对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仰韶时期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并存还是半坡文化发展为庙底沟文化,提出了新的看法,这就是薛新明、杨林中和我著作的《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和我的《尖底瓶的起源》(《文物季刊》1994年1期)。两篇文章均认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不存在谁发展为谁的问题,而是地域相邻、互为影响的两支考古学文化。枣园文化是庙底沟文化的前身,转变为庙底沟文化的时间,与半坡文化晚期“史家村文化”阶段同时。至少可以这样认为,仰韶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尖底瓶,是枣园文化的折唇壶演进而来的,泥质钵、盆和夹砂罐也一脉相传,只是盛极一时的彩陶图案,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对比,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新出现的。有了这些全面研究的基础,遂于1994年将“枣园H1遗存”,径直地称为“枣园文化”。

其实,早在1960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翼城古暑遗址调查到陶壶口部残片(原报告图4: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6);垣曲古城东关自1980年以来也有发现,后来他们命名的“东关一期文化”,也当属于“枣园文化”。

枣园文化一经确认,我与他人一起,陆续复查了曲沃新村、里村西沟、绛县周家庄,试掘了侯马褚村、襄汾南小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宋建中、薛新明等新发现了闻喜坡底,发掘了阳城大宁、垣曲宁家坡、芮城寺里一坡头等遗址。在

隔黄河的河南,新安荒坡,澠池班村、任村等地,也发现这一遗存。

1995年陕西也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在西安以东的潼潼零口遗址,也发现了枣园文化的踪影(周言:《专家论证零口遗存》,《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清理了大量的灰坑、墓葬,还进行过热释光测年。我们的近邻到如今,已经发表了八篇报告和论文,论述他们命名的“零口文化”。我在《零口遗存的认识问题及其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中指出:“实际上就该遗址现已发表的资料而论,充其量使我们认识到陕西东部地区也有枣园文化晚期遗存的线索。”他们对同一材料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的认识。不管怎么说,任何发现和争论都是考古学前进的先决条件。

2001年《垣曲古城东关》出版、2004年《翼城枣园》、《临潼零口村》相继出版,这三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是现在能看到的枣园文化的专门成果。

围绕着枣园文化,薛新明、杨林中、田建文、宋建忠、许志勇、阎额民、周春茂、孙祖初、戴向明、赵春青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就其年代、性质和源流,展开热烈的讨论,见仁见智,显示了枣园文化在学术界中的特殊地位。

1993年4月,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平朔举行。我的导师张忠培教授,在满怀激情的发言中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方面,目前已知最早者(山西),是枣园H1为代表的遗存。其次,粗看起来,有三种情况,除可分别归入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者外,另一种是同时含有这两种文

化的遗存。枣园 H1 为代表的遗存,当不是这三种东西的前身。如是,这就很重要了。因为,这里透露了一个讯息,即在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之前,山西有自己的东西。应该缘此进行探索,以解决旧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怎样转化为新石器时代的问题。同时,据我估计,在半坡文化之前,山西并非只有枣园 H1 那种遗存,当还有文化面貌、特征与其有别的他类遗存。如是,这方面就有很多工作可做了。”(山西省考古学会等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一言中的,足见枣园文化发现的意义。

一、翼城：表里山河

翼城县位于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东南隅。东与晋城市所属的沁水县相邻;南与运城市所属的绛县、垣曲以中条山为界;北与浮山、襄汾县毗连;西与曲沃县接壤。县境东西宽约 44 公里,南北长约 53 公里,总面积约 1160 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circ}34'$ — $112^{\circ}03'1$ 北纬 $35^{\circ}23'$ — $35^{\circ}52'$ 。晋韩〔山西晋城—陕西韩城〕公路、侯月〔山西侯马—河南月山〕一级电气化铁路东西横贯全境。虽然县境之内的地形相对封闭,但由于地理位置适中,自古以来就是西通陕、甘,东达鲁、豫,北上燕、赵,南下荆、楚的咽喉要地。

地处太岳山、中条山与临汾盆地交接地带的冀城县,地形的总体格局是北、东、南三面环山:南部为属中条山脉的翔山、历山、望月山,东部是属太岳山系的佛爷山,北侧横豆

着由临汾盆地中部隆起的塔儿山、河上翁堆山,这些山地组成一个马蹄状弧形半圆;在这个半包围状态内为浍河冲积平原,与临汾盆地汾河下游平原连成一片,地势平坦,东西狭长;在山地向中部平川过渡的地区广泛分布着黄土丘陵。根据地理单元的划分,翼城县境内的整个地形地貌分为中条山侵蚀地貌区、黄土梁卵侵蚀堆积地貌区和平原台地堆积地貌区三大部分。各种地形所在区域的海拔高程不一,西部最低的平川区在 500—800 米之间;东南部及东、北最高的山岳地带海拔约 1500—2000 米。山峰与冲积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间于 800—1200 米之间。在山峰与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的总体趋势是倾斜的坡地,地面普遍被更新世形成的黄土覆盖,一般厚度达 50—100 米。

丘陵地带的黄土堆积被发源于山区的山洪顺着坡状地势冲开了不同走向的羽状河谷,深者达数十米,谷底往往出露上新世以前的地层;本为山前坡式洪积区的地貌也被切割成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台地,致使丘陵地区沟壑纵横,梁峁交错,几乎没有一块整合开阔的区域,土地的利用率较低,土质也良莠不齐。中西部平原地带由于长期以来均接受大量来自周围的山峰、丘陵地带的冲积物,所以堆积了大量上新世的红色粘土、第四季松散黄土,包含着这些冲积、洪积堆积和沉淀物的土壤非常肥沃。

翼城县境内有大小河谷 90 余条,均属黄河水系,是汾河下游地区交流浍河的上源和主要水源补给区,这些河流绝大部分是山区向中部排泄雨水形成的冲沟,也有部分泉水汇集的溪水。浍河是该县境内最大的河流,除浍河干流

之外,县区内其它的河流大部分均汇入浍河,于县境中北部形成一条东西狭长的浍河谷地。与黄土高原其它地区的河流一样,水量受季节影响明显,含沙量较大,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浍河谷地与汾河下游平原共同组成临汾盆地的主要部分,自古以来就是山西省最重要的的粮棉产区。

由于县境纬度仅相差 29',从大的气候带划分上说,全县均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丰富,季风强盛,四季分明,雨量适中。年均日照时数为 2408.7 小时;年平均气温约 11.8℃,1 月份最冷,7 月份最热。受地势高程落差的影响,无霜期的区别十分明显,平原地区为 186 天,山区仅 156 天,相差约 20 天;年平均降水量约从 510 毫米到 585 毫米不等,东部山区偏多,中西部平原地区偏少,丘陵地带间于二者之间。

受不同气候要素在不同季节的交替影响,翼城县一年四季气候特点各不相同:冬季多风少雪,寒冷干燥。春季多大风降温天气,由于暖湿气流相对较弱,降水偏少。夏季以雷阵雨、大暴雨为主,持续高温少雨的夏旱较多。入秋后,连绵的阴雨天气较多,一年中绝大部分降水集中在这一时期。

翼城县的土壤类型十分复杂,农业分为东部山区温暖杂粮区、中部丘陵干旱棉麦区和西部平川温暖粮棉区三个大的区域,其间有不太明显的分界线。

据《翼城县志》记载,历史上翼城县境内曾经山林茂密,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东南部的中条山区、北部的塔儿山区、东部的太岳山区和南部的翔山一带皆松柏杂木,遮天蔽日,

风景绝佳。但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毁林垦田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开荒面积逐渐扩大。后来,随着移民迁入、人口增多、战乱纷起,滥伐森林、烧山开荒现象日益严重,加之山林火灾的频频发生,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二、枣园:天时地利

晋南是山西考古学文化遗存发现最多的地区之一。陶寺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里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翼城与曲沃交界的曲村北面,有座小村子名“尧都”,曾引起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的长时间注意。翼城作为临汾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西部平原地区和西北部塔儿山南麓山前地带,新石器时代古遗址分布十分密集,到了夏商周三代,翼城感军遗址出土的夏代三足瓮,凤家坡发现过西周铜器墓,天马一带曾是晋国始封地“唐”或“故蜂”的主要寻访点,苇沟——北寿城遗址发现西周晚期的城址,南唐、北唐、云唐及故城都有跟晋国历史有关的典故,这些遗存和事迹均昭示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引起考古、历史界的普遍关注。

与翼城西部平原地区的考古发现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东部山前地带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发现较少,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这里的考古工作仅限于零星的地面调查。由于发现的遗物、见到的遗迹并不十分典型,资料积累也不系统,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这些已经发现遗存的认识,甚至了解也有限。

有了距今一、两万年的襄汾县丁村 7701 地点、沁水下

川文化的山西,却一直未找到早于 6000 年的文化遗址。如何找到? 我们首先考虑当时是在约一万多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以降,限于掠夺式采集,人们一般走出山区,到丘陵地带或山间盆地,才能进行农业革命。而翼城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现这一时期遗存的地区。我们的目光就聚集在翼城一带,遂发现了枣园。

用现在的眼光看,枣园遗址所在的地域环境并不优越,山前地带宽度有限,自然冲沟和两条河谷又截断了向两侧的延展空间,而且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呈缓坡状地形,无论是生产条件,还是生活资料的来源都不可能容纳人口较多、面积较大的聚落存在。然而,这里北依东北—西南的黄土梁,南侧和西侧紧临浍河的北侧主源之一—浇底河和史伯河(滑家河),依据这些自然条件,枣园及其周围地区十分适宜于小规模的人类群体居住,但却不可能发展成聚落的中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小型聚落。对于 6000 多年前的古代,只需具备初期农耕、狩猎、捕捞和家畜饲养等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枣园文化的创造者们选择这里居住的主要原因。

古人最初进入枣园一带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毁林种田、刀耕火种;随着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增长,然而枣园一带的范围实在太狭小,这个山前地带整体低于周围其它区域,并且受沟壑、河流的限制,无法向外扩展。根据我们对这里地理环境的初步分析,枣园文化的居民能够选择接近浇底河的低地居住,一方面说明当时人类还不能摆脱对水源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数千年来这里的地形变化

不太大,远古居民在此居住时,地理环境与我们今天所见基本相同。初期农业的单位产量很低,土地利用率也太低,自然条件成为限制聚落扩大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在枣园文化晚期或稍晚一些,枣园一带的地力已经下降,人口的压力远远超出这个小范围的山前地带所能承受的程度,居民们只能选择离开他们曾经生活了数百年的家园,另外寻找新的居住区。

枣园遗址发掘的情况表明,该遗址主要遗存在枣园文化的晚期时已经不太发达,在此以后就进入了一个较长的间隙期。虽然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也曾有人在遗址区之东有短时间或小规模的活动,但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枣园文化之后,原来的居民们继续将这里作为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区域。

北墩和南墩遗址与枣园遗址相距不远,但是这两个遗址区的地理环境比枣园遗址所在地开阔,有向周围扩展的余地。两个遗址的遗存均十分丰富,而且特色鲜明,代表了当地庙底沟文化时期的主要文化面貌。

三、发现:千呼万唤

埋藏有山西到目前为止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的枣园遗址,静静地横亘在浇底河畔,等待着性情中人,心有灵犀般的青睐。

20世纪70—80年代,与山西省毗邻的陕西、河南和河北先后发现了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等一批

早于仰韶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极大地刺激着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在认真思考之余,我们开展了数次针对性的调查工作,顶着烈日、甘于寂寞,辛勤奋战在田间地头。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在1991年,在翼城县枣园村,发现了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它不同于以前认识较成熟的仰韶时期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先期命名为“枣园 H1 遗存”。当然,说它“跨越前仰韶到仰韶时期”和“新石器早期”,还基于我们当时对新石器时代分期及仰韶文化和仰韶时期的理解,与专家、学者们有些不同。

这,还得从周忠说起。1988—1989年,侯马市博物馆负责人周忠,十分热爱文物考古工作,他正好承担侯马市文物调查任务。说实在的,侯马晋国遗址虽然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对全境的文物分布情况,并不十分了解。那时的周忠,只有高中学历,从部队复员后,先是到侯马市蒲剧团干后勤,蒲剧团解散后,又分配他到博物馆工作。在短短的几年间,对文博事业的痴迷程度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所想、所干都是它,不懂就到处请教,自己买了不少专业书。骑着一辆加重自行车,终日奔波在田间断崖旁,捡陶片、做登记,侯马许多遗址的确定与周忠的辛苦是分不开的。后来,他又邀请我一起复查所有遗址。记得1988年暑天,我们既有万水千山走遍的豪迈,又有分享片刻时间挲掌陶片和遗址望气的喜悦。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搞考古,哪能不到实地去跑跑?”后来我们将这次调查结果发表在《文物季刊》1992年1期上(侯

马市博物馆:《山西侯马市古文化遗址调查报告》)。其中崖上、单家营、西阳呈都发现了以后被命名的“枣园文化”的遗存。

1990年9月,张忠培教授偕同师母马淑琴女士来侯马散心,我请他们到侯马市博物馆看崖上采集的大半个陶壶。张先生说:“与大司空村文化类似!”醍醐灌顶的一句话,引起我长时间的思考。后来逐步意识到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不一定是从陕西(西安地区)复制出来的。其间,我又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陈斌先生《万荣西解遗存的发现及其在仰韶文化中的位置》(《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总第11期)一文,令人耳目一新,也感觉到一种我们认识不到的文化或类型,正在朝我们走来,只是我们怎样对待它的问题了。

1990—1991年,为了配合侯月(山西侯马—河南月山)铁路建设,对北撤遗址的发掘是翼城县境内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收获也最丰富的史前考古发掘工作。1991年5月6日,无事可做的我,听到杨林中到翼城北撤遗址发掘工地的消息,薛新明在那里主持着,连忙骑着自行车赶往。当即商量对翼城东部地区以北撤遗址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约20公里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区域性摸底调查,5月7日开始,重点复查了南撤、南卫、殿儿垣及东木板遗址,采集到一部分具有代表性文化遗物,如南卫南撤H1、H2,南卫H1。此前,听浮山县文物干部张笑尘先生在周忠家讲,过去参加文物普查,枣园村有新石器陶片,泥质红陶很多,陶质很好;南面还有战国的陶罐,放在一个依断崖掏

的壁龛里。枣园,成了我们此次调查的最后一个点。

5月11日,依既定计划途经枣园,到河上翁堆山前的丘陵地带调查。从北撤出发,向北到紫琴村,杨林中认真地说:“晋南的村名就是好!紫琴,多么美的名字呀。”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翼城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阎紫琴,遭国民党杀害,而将他的出生地改名的。穿过村子后就是浇底河南部相对高度达30米的大断崖。站在断崖上向北眺望,浇底河与史伯河(滑家河)相交处的小河口水库湖水碧绿,波光粼粼,水库对岸的东北部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黄土梁。该梁的东南侧,依山面水,坡度适中,符合古代人类选择栖居地的条件,现在的枣园村就坐落这个库区旁相对缓平的坡地上。行进途中,在临县老家办社火时,当过秧歌伞头的薛新明,经不起鼓动,一路唱着委婉动听的吕梁民歌;杨林中拿着铁锹、手铲,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路;我自恃跳得很远,放着往南走不了多远,就有几块石头放在河里垫的路不走,非要跳给他们看不可,结果一下跳到浇底河岸边齐腰深的淤泥里,他俩喜哈哈营救的情景,至今难忘。

接着,在枣园村南,通往牢寨煤矿的铁路专用线两侧断断续续的黄土崖上,首先发现了少量灰土堆积,并采集到一些零星陶片。由此向铁路西侧实地勘察,又发现了与铁路线两侧采集陶片特征相同的文化遗存。以此为线索向四周扩展,我们初步确定了该遗址的大致范围,并且在铁路线东北侧通向枣园村内的小路旁发现了一个上部已被破坏的残袋状灰坑。灰坑位于一户村民院子外向南倾斜的坡地上,

是一个临时牲口圈,旁边弃置着许多生活垃圾,时不时挖土垫圈。坑内密集的红陶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随后采集了坑内的全部遗存,编号为枣园 H1。不少陶片出土时就是大片,当时就能看出可以复原几个钵、一个壶。以后整理复原了二十多件陶器,一次调查发现了一个“遗存”,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过后思考,“枣园 H1”,是一座半地穴式的房子。

6月下旬,又复查了该遗址。从 H1 北面一户姓郑的村民家中,征集到一件石磨棒,据说这是他在 20 年前盖房子取土时发现的。在距 H1 东约 80 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二里头时期“东下冯类型”的灰坑,编号为 H2。

四、发掘:时不我待

1991 年调查发现的 H1,成为我们最初提出“枣园 H1 遗存”时的全部资料。那时的研究结果是:“以枣园 H1 为代表的遗存与北首岭 77M3、77M17 等到单位的年代同时,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与河北易县北福地第一期甲类遗存年代相若”、“它早于整个仰韶时期”。当时学术界均认为仰韶时期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早于该时期的遗存自然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是前仰韶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抑或处于前仰韶时期与仰韶时期二者之间的临界点上。在此之后,学术界将原来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等文化划归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早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再后来,孙祖初提出用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过渡期”来概括枣园文化所在阶段的

文化遗存。

同时,我们认为:枣园 H1 遗存是庙底沟文化的前身,在半坡文化晚期“史家村文化”阶段,受到半坡文化的强烈影响,转变为庙底沟文化(田建文:《尖底瓶的起源》,《文物季刊》1994 年 1 期)。

1991—1992 年,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与枣园 H1 时代相当的其它遗址的情况,在侯马、翼城、襄汾县又进行过几次调查和复查,其中侯马周围的单家营、崖上,曲沃新村、里村西沟等地又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遗物。1991 年初冬,小规模试掘了侯马褚村遗址,发现了略晚于枣园 H1 的文化遗存,它们的主体风格相同,只是器物更规范一些,有纹饰陶器所占的比例增大。在报告和其它一些论文中,称为“褚村一期文化”。

“枣园 H1 遗存”及研究结果一发表,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张忠培先生看过发表的报告后,1992 年夏天考察晋侯墓地发掘现场后,趁着到侯马乘火车的空闲,专门看了枣园 H1 的全部材料。在侯马招待所,我去看他,老师有点激动的说:“行啊!我的学生有本事了。没有看到这批东西之前,我还以为你没弄清呢!对不起呀!”从此,他时刻关心枣园文化的研究进展。

正是因为有良好的研究背景,1994 年 9 月的“丁村文化暨晋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我在提交的《山西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问题》论文中(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年),将“枣园 H1 遗存”,改称为“枣园文化”。因

为它具备了一个文化命名的基本条件。

1995年,陕西临潼零口遗址、垣曲宁家坡遗址先后发现了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山西垣曲古城东关 IV 区仰韶早期遗存的部分资料以简报的形式公布。后来,在豫西地区的孟津荒坡遗址也发现了内涵接近的文化遗存。这些新资料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并就此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成为近年来关于陕、晋、豫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从而使我们终于有条件重新估价并综合研究枣园遗址这类遗存的一系列问题了。

另一方面,山西省文物考古界对枣园遗存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并对此遗址保护问题特别关注。1996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枣园遗址与北撤、南撤等遗址一起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计划是:将这三个遗址合为一体,研究枣园文化到西阴文化的转变过程及存在方式、文化构成等。现在看来,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由于枣园遗址最主要的文化堆积位于村中部,这里早在遗址发现以前便已建起了不少房屋,居民们日常生活取土又曾经破坏过部分遗迹。虽然政府对遗址的保护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遗址位于现在的枣园村中心部位,居民盖房、取土及自然侵蚀的破坏相当严重,很难对遗址区的所有遗存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在那些濒临破坏的部位进行适当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这既是对遗址最好的保护,也可为学术研究提供科学、完整的资料。